



节日抑或庙会：土族“纳顿”属性辨析

——基于民俗学主义研究视角的认知

[文章编号] 1001-5558(2018)02-0208-08

● 刘目斌

摘要：依据文献和田野调查可知，土族纳顿节的名称是由地方精英于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的，此后得到政府、媒体和学界的认可。此前乃至当下，地方民众习惯上称之为纳顿会，或者七月会、八月会、九月会。在本土知识中，土族“纳顿”是以酬神献祭为目的仪式庆典活动，兼具节日与庙会的文化复合性。对于土族“纳顿”固有庙会属性的辨识与确认，有助于规避其在非遗保护过程中失去内在的精神信仰根基，而走向民俗学主义发展趋向的潜在危险。

关键词：土族“纳顿”；庙会；节日；本土知识；民俗学主义

中图分类号：K890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在民俗学、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中，节日与庙会均为重要的研究议题。其中，节日尤其是传统岁时节日必备的文化要素，一是与年度周期内物候转换相适应的特定节期；二是具有特定的风俗活动内容，不过其内容未必像庙会那样往往与地方神灵崇拜及其祭祀活动相关，可以是以纯粹的休闲娱乐为目的的活动内容；三是节日往往是一个民族或地域社会中全民共同参与的“社会事实”，具有全民性之特征，村落乃至于地域社会是其发生的文化空间。但对于传统庙会而言，它往往以神灵的诞日或忌日为会期。无论从功能主义还是从结构主义视角来看，庙会作为与民众的精神信仰密切相关的社会组织形式，以地方神灵为崇拜对象，以酬神祈福、献祭还愿为目的的神灵祭祀仪式，则是其组织活动的核心内容。庙会不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黄河上游与长江下游傩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比较研究”（项目编号：12CMZ032）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 2018-02-10

【作者简介】 刘目斌，安徽大学农村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暨社会与政治学院人类学系讲师，民俗学博士。电邮：molandliu@126.com。合肥 230601

① 在杏儿沟一带，同属二郎神祭祀圈、藏族民众占主体的六处村庙，每年举行以献祭为主的八月会。藏族八月会与土族纳顿节有着不同的仪式表达方式，体现出族际间“和而不同”的社会交往模式。

西北民族研究

N. W. Journal of Ethnology

2018 年第 2 期(总第 97 期)

2018.No.2(Total No.97)

一定为地方社会全体民众共同参与，寺庙及其周边地界是其活动的神圣空间。

青海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三川地区的土族“纳顿”，是地域社会中以村落为单位联合举行的以二郎神及其他神灵为祭祀对象、以跳“纳顿”酬神献祭为目的的神灵祭典仪式^①〔1〕。因其节期长、地域分布广、节俗内容丰富，被誉为“世界上最长的狂欢节”〔2〕〔3〕，亦被称为“中国少数民族重大节日”〔4〕。然而，已被批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土族纳顿节，是否原本具有庙会的文化属性？如果是，现今地方政府一味强调其世俗狂欢的节日属性，是否忽略了其庙会属性？若是，这对于其保护传承将会产生怎样的负面影响？对此，笔者将结合民俗学主义的研究视角加以探讨。

“民俗学主义”（也译作“民俗主义”，德文 Folklorismus，英文 Folklorism），是 20 世纪 60 年代兴起于德国的概念。到 20 世纪 80 年代，在德语圈民俗学界出现了讨论民俗学主义的热潮，此后在欧、美、日本等地普及，并成为国际民俗学界的共同话语。这一概念，“主要指某种民俗文化事象脱离原来的生存空间，以新的功能、为了新的目的而得以再现。简言之，民俗学主义便是第三者对民俗文化的利用。”〔5〕2003 年，《日本民俗学》刊行“民俗学主义专号”，将其定义为：“人们轻易挪用民俗文化要素，通过只保存表面部分的表演和传统性的自我扮演，来满足那些生活在都市的观光客等人的怀旧心理或需求的状况或现象。”〔6〕在此基础上，岳永逸结合对河北赵县龙牌会的考察，对于“第三者”作了进一步界定：“第三者包括与该民俗事象相关的所有人，既包括利用该民俗事象提升政绩、发展经济、丰富文化等多重目的的行政官员、发财致富的开发商，也包括前来调查研究的学者、新闻工作者等外来人，还包括按惯例继承这些民俗的传承者。”〔7〕即包括民俗传承者在内的各个异质性群体都被视为“他者眼中的第三者”。

结合“民俗学主义”的概念内涵，笔者认为，鉴于土族纳顿节已被批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文化部门、旅游部门着力关注该节日的狂欢性与世俗性，意在将其作为重要的民族文化资源加以开发和利用，以促进当地旅游观光业的发展，这一保护发展现况，将有可能使其逐渐走向民俗学主义的发展困境。即如果包括地方政府、旅游管理部门、学者、地方精英以及部分民众在内的“第三者”，仅仅着重关注其节日属性，而忽略其庙会属性的话，那么，将有可能最终改变土族“纳顿”的发展样貌，而衍化成仅保留表面成分的傩舞艺术展演，来满足外来观光客的心理需求的文化现象。鉴于此，本文旨在依据文献与田野调查资料^①，在尊重土族民众主位看法的基础上，对于土族“纳顿”的固有文化属性予以辨析，以规避其在保护传承过程中失去内在的精神信仰根基而走向民俗学主义发展境地的危险。

二、土族“纳顿”的庙会属性

土族“纳顿”，包括“纳顿”小会和正会，一般由祭神（献蒸饼，献祭公鸡、羯羊还愿）、主客队跳“会手舞”以及“庄稼其”“五将”“三将”“五官”“杀虎将”之酬神娱神表演、“跳法拉”等内容组成〔8〕。据口碑资料，土族“纳顿”具有久远的历史传承，可追溯到元代蒙古大军征战西北的历史场景〔9〕。不过，从笔者所见文献及田野访谈得知，“纳顿”节这一称谓，是 20 世纪 80

① 笔者的四次田野调查时间为：2007 年 2 月 6 日—3 月 26 日、6 月 1 日—7 月 10 日、8 月 19 日—10 月 29 日，2013 年 9 月 11 日—20 日。

年代才出现的节日名称。此前乃至当下,土族民众据其举办时间所在月份,习惯上称之为“七月会”“八月会”“九月会”,或统称为“纳顿会”。以下,从文献溯源与仪式实践两个层面,对其庙会属性加以辨识。

(一)文献记载中的土族“纳顿”庙会属性

有关土族纳顿的记载,笔者曾查阅民国以前的地方文献,均无所获。其最早记载见于20世纪50年代由陈永龄、汪公量、宋蜀华等组成的青海土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记录下的土族民众迎请二郎神过会的盛况:

在各村庙会期间,迎接二郎神的仪式则比较复杂。各村庙会日期按一定次序,在庙会的前一天将二郎神迎来……迎接时用八人抬的轿,带着锣鼓,打着十几面大旗……二郎神到村口时,全村的人都来跪在两边迎接。有的人牵着向二郎神许过愿的羊和鸡。在解放前,这种还愿的羊鸡非常多,如官亭村每年差不多有一二十只羊、四五十只鸡……全村的人都要烧香、点烛、烧黄裱。在供桌前供着鲜供(即馒头),每家十二个……有的妇女许下的绸布条和荷包等便要挂在神像身上。嘛呢会的老人便开始念嘛呢。献羊鸡的人将羊鸡牵回家宰了,煮好以后要将羊蹄肝肺端去两盘,另有一盘端着黄裱香烛献给二郎神……^[10]

同时,上述少数民族历史调查组还记载了三川土族“戴大面具”举行跳神会的情况:

过去,土族每年秋季有跳神会,戴大面具,而所扮演就是汉族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如关公、张飞、赵云^①等等。土族信奉二郎神(封神榜中的杨二郎),也就是甘肃汉族人在清末回民起义时传进来的^[11]。

以上,调查者以“五区官亭”为例,就庙会中迎请二郎神以及献祭还愿之仪式过程进行了详细描述,其中没有出现“纳顿节”的称谓;并且,调查手稿中还特意将跳神会与土族传统节日区分开,甚而还没有使用土族语音译而来的“纳顿”一词,而是称之为“跳神会”。总之,献祭还愿与戴面具跳会酬神,是20世纪50年代三川土族地区以二郎神及其他地方神灵为祭拜对象的庙会的核心内容,也最能体现其庙会的文化特质。半个世纪前的土族跳神会是这样,今天的土族纳顿会亦是如此,其深层次的庙会文化属性一直未曾改变。

至20世纪80年代,青海学者李友楼在《土乡风情记》中也是将“纳顿”列入土族传统庙会的范畴,并将其排除在土族传统节日体系之外。他强调:“民和三川地区的‘纳顿’会,更富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可作为土族传统庙会的典型。”^[12]至90年代初师守成指出:“近年来被人们普遍称为土族民间狂欢节的土族‘纳顿’会,已逐渐演化成以愉悦群众为主体的节日活动。”^[13]在此,师守成不仅指明了土族“纳顿”原本具有的庙会属性,而且指出其向世俗狂欢的节日演化的趋势。

① 在全面跟踪调查中,笔者并未见到各村“纳顿”傩舞展演中有“赵云”这一角色,特此说明。

由此引人思考,既然文献中称为庙会或“跳神会”,而没有“纳顿节”的称谓,那么,土族“纳顿节”的名称是如何产生的?在本土话语体系及仪式实践中,土族“纳顿”的属性是什么?它是土族的传统民族节日,还是传统的庙会仪式,抑或是兼而有之?

(二)仪式实践中的土族“纳顿”庙会属性

一方面,关于土族“纳顿”的命名,笔者在2007年农历七月九日至九月十五日对整个三川“纳顿”进行了长达两个多月的全程调查后发现,在本土话语体系中,土族“纳顿”有着不尽相同的称谓方式:

一是在单姓村落中,往往以其姓氏称之,如上川地区的“窦家纳顿”“余家纳顿”“鲍家纳顿”等。二是在两个或多个姓氏杂居村落中,以人口占主体的姓氏称之,如中川地区的“大户祁家纳顿”“大户王家纳顿”“鄂家纳顿”等。三是在姓氏比较复杂的下川民主沟和上川山地村落,多以村落或聚落名称称之,如“桑不拉纳顿”“鞑子庄纳顿”“梧释六户纳顿”“结隆庙纳顿”等。四是在村落内部话语体系中,有些村落随其庙神称谓其“纳顿”,如下川地区鄂家、宋家供奉摩竭龙王的村落称之为“龙坛宝会”,赵木川一带以二郎神为庙神的村落称之为“二郎喜会”。不过,无论是村落民众的自称,还是村落外部民众的他称,均无“纳顿节”名称出现。

另一方面,针对土族“纳顿节”的名称由来及其文化属性,笔者在田野调查中着重访谈了二郎神前往过会的三川地区29个村落中土族、藏族和汉族之不同民族的民众,以及土族内部不同年龄阶段的群体所给出的地方性认知,概括如下:

一是在土族、藏族、汉族不同民族的29个村落所构成的有关二郎神的祭祀圈内,各族民众对于当地过会的名称有着较为一致性的认同,即根据本村过会时间所在的月份,分别称之为“七月会”“八月会”或“九月会”。二是除了习惯上以过会所在月份加以称谓之外,民众还依据村庙主祭神灵的名称,给本村“纳顿”以更为地方化的称谓,如“龙坛宝会”“二郎喜会”或“二郎报恩喜会”等。三是在土族内部不同祖籍地来源的群体之间以及上川、中川、下川不同地域之间,以及土族内部不同年龄阶序的群体中间,存在着对于仪式名称认同上的差异性。四是地方文化精英是“纳顿节”名称的提出者和支持者,其有关土族“纳顿”节日属性的大力提倡,影响到了研究者的学术认知,以至于后来研究者对其庙会属性不加辨析,而直接采用“土族纳顿节”之名称^[14]。不过,无论是地方精英还是外来研究者的做法,均有悖于地方仪式实践中的主位话语表达。

此外,在从土族“纳顿”命名与本土话语认知的角度,对于土族“纳顿”所具有的庙会属性予以确认之后,笔者将着重对土族“纳顿”仪式实践中体现出的庙会文化属性予以分析:

第一,献祭还愿的神圣性。无论是每年农历四五月份二郎神及其他神灵“转青苗”期间,还是日常生活中遇到苦难之时,抑或出门谋生之前,土族民众习惯上向二郎神或者村落庙神许愿,待到本村“纳顿”到来之时献祭还愿。这其中包括以新麦制作的蒸饼、献祭的公鸡乃至羯羊,以及各村民众集体敬献的“观钱粮”(神幡)和个体家户祖上许愿向神灵敬献的幡杆,这些均体现出了土族民众精神信仰的虔诚性和神圣性。

第二,跳“纳顿”酬神的虔诚性。在中川、下川和上川官亭一带诸多村落的“纳顿”仪式上,土族民众在跳“纳顿”酬神娱神的文化表演中,恪守着“三三见九”的规制。即,无论是集体表演的会手舞,还是在由当年轮值的水排头扮演的“庄稼其”“五将”“三将”“关王”“五官”等面

具舞,每个剧目均包括三种动作,每一种动作均要表演三遍,总共表演九遍,是为“三三见九”。这里取单数中最大数“九”,以表达民众酬神的虔诚之心,从中也体现出仪式展演的神圣性。

第三,酬神表演中“关公”角色之神圣权威的象征性。在中川以及上川官亭一带,折子戏“五将”“三将”“关王”中关公的角色扮演具有极其严格的规定性。一般情况下,只能够由当年轮值的大排头来扮演这一角色。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为争夺这一角色扮演时有矛盾冲突发生。对此,当地民众谈道:

我们这里老爷(即关羽)的面箍子(也俗称“脸子”,即面具)一般是不会让给其他人的。假如我今年当了大排头,这个老爷的面箍子戴上,装扮个老爷,跳上一回,也是一个非常吉利的事情,也显得最为威风,一般人家个人要跳哩。我要是跳不了,我的哥哥可以跳,再就是由一个家吾(即家族)里的人来跳,外人轻易不让给……过去,原本祁家跟文家、杨家是一庙一会,每年关老爷的面箍子大家争得不得了,这个说该我们文家跳,那个说该我们杨家跳,祁家人又说该祁家跳了。三个庄子争得不得了,结果是起了矛盾,年年打仗,后来就分开了^①。

第四,“纳顿”会场之仪式空间的神圣性。“纳顿”到来之时,村庙、“纳顿”会场与村落共同构成了仪式展演的神圣空间。就其神圣空间设置而言,“纳顿”会场或选在紧邻村庙外围的空地上,或选在村落中其他开阔的场地上,一般是由神职人员“法拉”代神言说选定的,一旦确定,不会再轻易更改。此外,在中川和下川一带,在“纳顿”会场的帐篷下,神轿子的位次排列顺序异常严格。

第五,神职人员法拉的权威性及其“发神”活动的神圣性。法拉,“巫神之一种,被视为当地‘方神’的替身。称其活动为‘发神’。”^[15]各村“纳顿”酬神表演结束之时,随即法拉“发神”,亦俗称“跳法拉”。法拉先为神灵收取钱粮宝盖,后是代神言说,传达神灵口谕。比如,神灵对于排头组织的众人酬神表演是否满意,对于排头们年中的村庙事务管理满意与否,是否有怠慢神灵之处,以及来年收成如何等。法拉的权威性及其“发神”活动的神圣性可见一斑。

综上所述,无论是在文献记载中还是在地方民众的仪式实践中,土族“纳顿”均具有明显的庙会文化属性。而且,从土族民众的信仰生活与仪式实践中看出,土族“纳顿”展演中跳“纳顿”酬神与献祭祈福的庙会属性,作为其深层次的精神文化内核之所在,作为其发生、发展的内在动力之所在,对于土族民众的伦理价值观念的形塑、精神信仰生活的调适以及地方社会秩序的维系发挥着重要作用。鉴于此,笔者认为,确认土族“纳顿”的庙会属性,对于其保护传承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是因为,目前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土族纳顿节,其保护中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认知误区和偏差,即枉顾其庙会、节日的双重性质,忽略其酬神献祭仪式的神圣性与权威性,仅热衷于强调其节日的世俗娱乐与狂欢性。显然,这一现况若持续发展下去,将不利于实现其整体性保护传承的初衷。而且,如今,在土族纳顿节被批为国家级非遗、被作为节日文化资源加以开发利用的背景下,如果一味强调其节日的外在狂欢性,忽略

① 受访者:祁祯祥,土族,时年45岁。访谈者:刘目斌。访谈时间:2007年8月2日。访谈地点:青海省民和县中川乡草滩村祁祯祥家中。

其庙会的内在神圣性,久而久之,则有可能使之走向“民俗学主义”发展的危险境地,甚而使之逐渐丧失传承的内在动力和生命力。

三、本土知识中土族“纳顿”的属性认知

在对文献和仪式实践中土族“纳顿”的庙会属性予以明晰之后,笔者将探讨在土族民众本土知识中关于“纳顿”的具体认知,以及对于民众生活的价值和意义。“本土知识”(indigenous knowledge),指“地方传统文化单位独立于科学知识体系之外而自成体系的知识”^[16]。它是地方土著民众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17],即主位的视角对其自身知识的自观和认知。

在田野访谈中,当笔者在不同村落问及土族“纳顿”是节日还是庙会时,三川土族人尤其是老年人往往以惊奇的目光打量一番,而后解释道:

“纳顿”是我们全村众人答报二郎大神和庙神的节。每年秋季庄稼丰收了,众人高兴呗,就跳个“纳顿”来答报方神^①,盼个来年好光景呗。这一年里,庙神和二郎爷保佑我们众人出门平平安安,家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我们要好好答报神灵。人要知恩图报啊!它也是我们一年中最为隆重的节日。它甚至比过年还被人看重,比过年还隆重。因为过年时仅仅是年轻人去给老年人拜个年,从初一到十五之前,哪天去都行呗。这个“纳顿”上不行,你早一天不行,晚了一天来也不行,就得必须过会这一天来亲戚家里。再说这天不仅是年轻人来串亲戚,就是你能动的老年人也要到亲戚家里来,比方说到已经嫁出去的丫头家里去,你不去里话,年轻人不高兴呗。因为过会这天主要是要到亲戚家的会场上拜神哩呗^②。

从中可知,在土族人本土观念中,以答报三川地域二郎宗神和村落庙神为目的所举行的“纳顿”仪式,不仅是全村各户人家集体参与下的酬神庙会,更是当地人“比过年还隆重”的重要节日,因为这一天如同土族年度周期内的其他节日一样,要有亲戚之间的礼尚往来。由此可知,在当地土族人的观念中,理解某一仪式是否为节日的前提,就是看有无亲戚间的社会交往,即有无人与人、人与神之间或二者兼而有之的互惠意义上的“礼物交换”^[18]。这一带有互惠性质的社会交换,在强化姻亲关系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了不同姓氏群体间的互助合作,拓展了家族的社会关系网络。

综上,三川“纳顿”仪式的确是颇受土族人看重的大型节庆活动,其特征也不同于东部汉族地区组织相对松散的庙会仪式。然而,在具体仪式实践中,三川人习惯上以“七月会”“八月会”“九月会”抑或“纳顿会”称之,以向神灵献祭为目的,以“一庙一会”“两庙一会”或“三庙一会”为组织形式^[19],这说明它同时又具有中国东部汉族庙会的仪式组织特征。因此,三川土族“纳顿”是兼具节日与庙会之双重性质的仪式祭典活动。然而,在同属于三川二郎神祭祀圈的杏儿沟藏族“八月会”与梧释沟山地土族“纳顿”期间,民众不注重亲戚间的社会交往与礼

① 方神,即地方神,此指作为三川地域保护神的二郎神,而本村庙的主祭神灵,则称为庙神。

② 受访者:宋保寿昌,男,土族,时年58岁。访谈者:刘目斌。访谈时间:2007年8月22日。访谈地点:青海省民和县中川乡美一村宋家纳顿会场。

物交换,也就不强调其仪式的节日属性。

四、节日与庙会:土族“纳顿”的文化复合性

依据文献与田野调查可知,土族“纳顿”节的名称,始见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传统文化复兴之时,是由地方文化精英命名并传播的。此前乃至当下,土族“纳顿”被一般民众称为“纳顿会”,或“七月会”“八月会”“九月会”。土族“纳顿”原本具有以酬神献祭为主旨的庙会属性。另一方面,从“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看,在本土知识中,土族“纳顿”不仅是全体民众共同参与的以酬神献祭为目的的庙会活动,而且更是年度周期内比春节还要隆重的民族节日。可见,土族“纳顿”兼具节日和庙会的双重文化属性,或者说具有文化复合性之特征。

然而,在地方政府全力挖掘民俗文化资源而发展旅游观光业的时代背景下,政府文化部门、旅游部门乃至学界关注于土族“纳顿”的节日属性,且仅注重其仪式实践中民族民间舞蹈艺术表演的节日狂欢性与世俗性,而忽略其以酬神献祭为主旨的庙会属性,忽略其蕴含着土族民众精神信仰内核的仪式展演的虔诚性与神圣性。鉴于此,笔者认为,这一有悖于国家非遗保护初衷的节日发展现况,倘若任其自然地发展下去,将使得土族“纳顿”在保护传承过程中有失去内在精神信仰根基的潜在风险。因此,从学理层面上说,对于土族“纳顿”固有庙会属性的重新确认,对于其兼节日与庙会之文化复合性的辨识,如果能引起地方政府的注意,则有助于规避其最终走向纯粹的“民俗学主义”发展境地的危险。

参考文献:

- [1] 刘目斌.地方认同与族际关系的仪式表达——青海三川地区二郎神祭典仪式的考察[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5).
- [2] 邢莉.中国少数民族重大节日调查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
- [3][9] 马光星,赵青阳,徐秀福.人神狂欢——黄河上游民间雉[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3.2.3-4.
- [4] 《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概况》编写组编写.《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概况》(修订本)[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18-19.
- [5] [日]西村真志叶,岳永逸.民俗学主义的兴起、普及以及影响[J].民间文化论坛,2004,(6):70-75.
- [6] [日]西村真志叶.民俗学主义:日本民俗学的理论探索与实践——以《日本民俗学》“民俗学主义专号”为例[J].民间文化论坛,2007,(1):58-66.
- [7] 岳永逸.乡村庙会的多重叙事——对华北范庄龙牌会的民俗学主义研究[J].(台湾)民俗曲艺,2005,(147):106.
- [8] 刘目斌.“青海省民和县三川地区纳顿节调查报告”.中国节日志·纳顿节[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5.3.244-334.
- [10] 陈永龄,汪公量等.青海土族民间信仰[C]//青海省编辑组.青海土族社会历史调查.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5:40.
- [11]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民和县官亭乡土族社会历史调查材料(手写稿)[Z].青海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档案馆藏,1958.21-22.
- [12] 李友楼.土乡风情记[C]//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青海分会编.青海民族民间文学资料(第一辑).内部资料,1983:36.
- [13] 师守成.青海民间传统节日文化的特征及走向[C]//高占祥主编《论节日文化》.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221.
- [14] 贺喜焱.青海民和土族“纳顿节”的田野调查[J].民俗研究,2005,(3);文忠祥.土族纳顿节[M].西



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9；胡芳，马光星，三川土族纳顿节[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0．等．

[15] 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民和县志[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595.

[16] Barnard Alan Jonathan Spencer.1996.*Encyclopedia of Soci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M].London: Routledge, p.609.

[17] [美]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 —— 阐释人类学文集[M]．王海龙，张家宣，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70-92.

[18] 褚建芳．人神之间 —— 云南芒市一个傣族村寨的仪式生活、经济伦理与等级秩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353.416.

[19] 刘目斌．地域崇拜与流动的认同 —— 青海三川“纳顿”仪式的田野考察[D]．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56-58.

(责任编辑：晓 蔓)

Is the Nadun of Tu a Festival or a Temple Fair?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Folklorism

Liu Mubin

Abstract: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and fieldwork, the author found that the name of the Nadun Festival of Tu, which is a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was proposed by the local elite in the 1980s, and then widely recognized by the government, media and academia. Before or since then the local people still call it by various names, such as Nadun Temple Fair, or July Temple Fair, August Temple Fair and September Temple Fair. According to indigenous perspective, “Nadun” is a ceremonial celebration with the aim of repaying god, with cultural attributes of both festival and temple fair. The recognition and confirmation of its temple fair attribute can help to avoid the potential danger of Nadun of Tu losing its inner spiritual belief foundation in the process of protecting inheritance, and then be shaped by folklorism.

Key words: the Nadun of Tu nationality; temple fair; festival; indigenous knowledge; folklorism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Formation of Wang Jingzhai's Patriot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ang Genming

Abstract: Wang Jingzhai was a notable Chinese patriot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s a chair of Hui and translator, he preached his “faith and love for our country” in mosques in the year 1921. His belief was propagandized in the Chinese Islamic community, with arousing sympathy. As a result, Hui had developed an overall sense of national unity and patriotism during this period. After the Mukden Incident, Wang Jingzhai directed his efforts toward calling all Chinese Muslims and people to unite against foreign aggression, ultimately prompting a heightened sense of patriotism in the Chinese religious community, as well as a desire to improve the country and religion. Based on new-found historical material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is paper depicts the process and content of Wang Jingzhai's patriotism, and explains its connotations.

Key words: Wang Jingzhai; patriotism; form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see P.171)